

從全球治理觀點論跨國企業 境外人權侵害管制模式

黃怡禎*

要 目

- | | |
|---|--|
| 壹、前 言 | 二、法國企業警戒法 (Duty of Vigilance Law, La loi sur le devoir de vigilance) |
| 貳、全球治理下行政管制典範的轉移 | 三、跨國企業境外行為管制模式 |
| 一、全球治理下全球行政法的出現及其正當性 | 四、歐盟最新立法發展趨勢 |
| 二、全球行政法在企業與人權領域的實踐現況 | 五、小結：比較法對於我國跨國公司境外投資管制模式的啟發 |
| 參、帶有域外影響的內國管制法律 (Transnational State Legislation) 的出現 | 肆、結 論 |
| 一、英國當代奴隸法 (UK Modern Slavery Law 2015) | |

關鍵字：全球治理、盡職調查、跨國公司、生產供應鏈、帶有域外影響的內國管制法律

投稿日期：110年05月31日；接受刊登日期：110年12月02日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本文初稿曾在110年4月行政法專題研究課堂發表，作者感謝授課教師林佳和教授以及修課同學的寶貴意見。兩位匿名審稿人對於本文內容提出諸多初稿疏漏與說理不足之處，使本文更為完善，作者獲益良多，於此致上誠摯謝意。

壹、前言

因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生產供應鏈打破國界的疆域，形成全球性的生產分工，跨國企業的數量也日益增加。追求利益最大化、減低成本的目標驅使之下，許多已開發國家的企業母公司，因為開發中國家的行政管制體制較為寬鬆，加上司法體制的不健全，選擇到開發中國家設廠，藉以規避母國較為嚴格的管制要求標準。在此脈絡之下，跨國企業在境外發生環境污染、人權侵害之事件亦不斷增加。

全球供應鏈之下所發生之人權侵害事件層出不窮，近期最受到關注的是許多跨國企業在其生產供應鏈中使用新疆棉產品，涉及新疆維吾爾人被強迫勞動等人權侵害爭議¹；或是手機或電子產品中所使用的原料，是透過童工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所挖掘和開採，成為生產供應鏈中的一環²；又或是近幾年備受社會矚目的台塑越鋼污染案，2016年4月間，越南河靜鋼鐵廠疑似因廠區發生跳電意外，排出含有苯酚、氫化物等有毒廢水，導致大量魚群死亡，而在越南河靜省及中部周邊省份的海域造成大規模的公害污染事件，使得以漁業為生的居民工作權，甚至是生命權受到侵害³。

¹ Eva Dou & Chao Deng, Western Companies Get Tangled in China's Muslim Clampdow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articles/western-companies-get-tangled-in-chinas-muslim-clampdown-11558017472>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² Annie Kelly, Apple and Google Named in US Lawsuit over Congolese Child Cobalt Mining Deaths,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9/dec/16/apple-and-google-named-in-us-lawsuit-over-congolese-child-cobalt-mining-deaths>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³ 台塑越鋼污染案是近幾年來備受社會矚目的臺灣企業跨國污染案件，台塑本來預計在雲林建設大煉鋼廠，但因為環評未過，而後選

在生產供應鏈跨越國界，串連全球的情況下，如何在追求經濟發展的情況下，亦能兼顧環境永續發展、勞動權益保障等價值，成為企業與人權的重要課題。在此背景和脈絡之下，為落實《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的精神，我國於2020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公布「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宣示未來將從國家保護義務、企業尊重人權、提供有效救濟等三面向，逐步健全企業與人權方面的法制，希望能在追求經貿發展和永續發展目標之間取得平衡⁴。

從近期台塑越鋼案採取跨國訴訟回應跨國企業侵權的訴訟過程中，突顯我國在國際管轄權之立法闕漏與不足，就國際管轄權是否類推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實務見解亦有所歧異，導致在程序面即耗費許多時間。本文認為，跨國訴訟固然是一種回應跨國企業侵權的模式和解方，惟訴訟程序耗時，管制措施或手段是否可能提前在跨國企業決定向銀行融資或是至國外進行投資之

擇到越南設廠。2016年4月間，越南河靜鋼鐵廠疑似因廠區發生跳電意外，排出含有苯酚、氰化物等有毒廢水，導致大量魚群死亡，而在越南河靜省及中部周邊省份的海域造成大規模的公害污染事件，使得以漁業為生的居民工作權，甚至是生命權受到侵害。臺灣律師團於民國108年6月11日代理越南中部省份7,875位居民向臺北地方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後遭臺北地方法院裁定駁回，而後律師團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抗告，亦遭到臺灣高等法院駁回抗告，律師團成員又針對該駁回抗告向臺灣最高法院提起再抗告，最高法院認為高等法院在國際管轄權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恐有疑義，因此廢棄原裁定，發回高院更裁。請參照張文川，敗部復活！越鋼污染案來台向台塑求償 最高法院發回更裁，自由電子報，2020年11月17日，<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3354244>（2021/05/31，造訪）。

⁴ 外交部防務處，臺灣首度公布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經濟成長兼顧民主人權 產業國際競爭力再升級，行政院全球資訊網，<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de53d248-0b06-4b3e-8554-77068fee1a74>（2021/05/31，造訪）。

前階段即加以介入？「跨國」(Transnational)在企業與人權的領域為重要特徵，也因為如此，以規制內國法秩序為導向的國內行政法已無法適切地處理此議題所產生的相關爭議，進而導致以多元的治理主體為特色的全球行政法現象於此領域更為明顯。跨國企業在境外人權侵害的管制難題，不僅僅是臺灣所面對的難題，在全球化下，各國亦面臨相同的處境，思考如何採取適當的管制模式。

本文首先在第貳部分介紹全球化的脈絡下，行政管制從僅以國家為唯一發動主體轉變為多層次的治理主體的典範轉移現象，進而聚焦於「企業與人權」此領域，透過國際組織、私人金融機構等自律組織等治理主體所制定管制跨國企業及其母國義務等規範，呈現全球行政法現象在此領域的實踐與展開。鑑於我國「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內容包括「我國企業在境外造成人權侵害」及「在我國境內實施商業活動的外國跨國企業於我國造成人權侵害」的議題，在第參部分，透過比較法的視野，就上開規範對象，分別以法國企業警戒法和英國當代奴隸法為對應介紹，以分析各國如何將國際對於企業人權規範涵納至內國法的現象，提供我國未來在企業境外人權管制面向上，提供比較法經驗。最後，希冀提供未來我國在制定相關法律制度，設計管制工具時一些啟發。

貳、全球治理下行政管制典範的轉移

「流動」(flow)作為全球化趨勢下的重要特徵，包括商品、資本、人力、文化、思想和制度等面向⁵，創造出不同於以往

⁵ 葉俊榮，全球化對行政法的挑戰：從行政法人的建制談起，收錄於法治與現代行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頁367，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恪守一國疆界的多元交流局面。然而，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同時，傳統行政法管制體制是否有能力處理各事務領域的跨國界流動產生的問題，成為一大挑戰。因應全球化的快速發展與趨勢，行政管制的範圍從原先依附於既有國界疆域，轉變為跨國進行管制和治理，同時也發展出不同的管制工具和形式。本文於此章將先介紹全球行政法概念的背景脈絡，接著討論全球行政法所蘊含的跨國治理何以證立其正當性，最後針對企業與人權的領域為研究範圍，點出在此領域所出現全球行政法特色的現象和管制工具。

一、全球治理下全球行政法的出現及其正當性

2005年聯合國大會上，聯合國前秘書長Kofi Annan以「更大的自由：朝向人人共享發展、安全和人權的方向」(In Larger Freedom: Toward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為題發表演說，他特別強調全球化的時代下，我們所面對的難題和威脅是相互關聯的，即便一國擁有強大的實力，它也無法獨自解決⁶。若更精確地來說，單純以國家作為行動與治理的角色，已無法有效地解決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議題，而是必須尋求另一途徑，即所謂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透過主權國家、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網絡等既合作又競爭的交織模式，發展出多層次的治理和管制模式，形成全球治理的治理結構和模式⁷。

全球治理的現象主要有以下特色：(一)行動者的多元化：

⁶ U.N. Secretary-General, *In Larger Freedom: Toward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59/2005/Add.3 (Mar. 21, 2005).

⁷ Jang et al., *Global Governance: Present and Future*, 2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1, 2 (2016). 林佳和，我國推動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之評估分析，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之研究成果報告，頁5-6 (2016)。

除了主權國家之外，包括如國際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等多層次、眾多的行動者也參與其中；(二) 新興治理機制和結構的出現：全球治理機制出現有別於過去傳統以主權國家為主導，或是以簽訂條約方式的治理模式，出現跨層級且多元形式的管制工具；(三) 跨層級和領域的治理結構：國際組織、跨國性的、國家內部等不同層級的多元行動者形成、制定規範與調控、管制工具⁸。

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行政管制領域也出現典範轉移的情形。過去將關注焦點聚集在單一國家內的行政管制，較少關注於跨國的行政管制運作模式⁹。傳統的行政管制模式通常是連結國家的強制力，由國家制定具有強制法律拘束力的法規範，管制的範圍也侷限於一國境內。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經貿生產供應鏈橫跨全球，行政管制的典範和模式開始出現多元的面貌，「跨國治理」(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在企業與人權的領域中是一項重要的治理特徵¹⁰。

面對全球化的現象，過去主權國家之間透過簽訂條約的方式，成立區域性國際組織，將部分主權賦予該國際組織，使其具有區域性治理的正當性，歐盟即為一例。1963年，歐盟法院在 Van Gend en Loos 該指標性的案件中，即說明為了各會員國的利益，各會員國移轉部分的權限給歐盟，建立國際法上的新秩

⁸ Frank Biermann & Philipp Pattberg,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aking Stock, Moving Forward*, 33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77, 280 (2008).

⁹ Colin Scott, *Regulation in the Age of Governance: The Rise of the Post Regulatory State*, in: J. JORDANA & D. LEVI-FAUR EDs.,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ULATORY REFORMS FOR THE AGE OF GOVERNANCE 145, 151-154 (2004).

¹⁰ Diggs et al.,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s a Galaxy of Norms*, 50 GEO. J. INT'L L. 309, 318 (2019).

序¹¹，並透過「優先性」(the principle of primacy or supremacy)和「直接效力」(direct effect)確保歐盟治理能順利運作¹²。但歐盟法優先性的原則並非牢不可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Solange I*, *Solange II*案中，即明確指出歐盟法優先性原則的適用範圍有所限制，主要理由基於歐盟的治理權限是來自於各會員國，也因此歐盟法優先性原則僅適用於主權授予範圍內，若歐盟法逾越先前主權授予的範圍，即無適用之餘地¹³。

然而，涉及跨國事務領域日趨多元與複雜，原先此種必須透過轉移部分主權和建立國際組織為全球治理的模式，恐已經無法快速因應和解決現今所面臨的難題，全球行政法因而在此脈絡下應運而生¹⁴。「全球行政法」主要由學者Nico Krisch、Benedict Kingsbury和Richard Stewart所提出，他們從行政管制的觀點來重新理解全球治理的模式，他們所觀察的現象是發動行政管制的主體不再僅由國家獨佔，治理體制的主體呈現分散且多元，包括正式組織、非正式組織、私部門等等，並試圖透過傳統內國行政法所擁有的透明、參與、說理義務等原則拘束全球治理體制，進而發展出所謂的全球行政空間(global administrative space)¹⁵。他們

¹¹ Case 26/62, *NV Algemene Transport- en Expeditie Onderneming van Gend & Loos v. Netherlands Inland Revenue Administration*, ECLI:EU:C:1963:1, 12 (Feb. 5, 1963).

¹² CHRISTA TOBLER, JACQUES BEGLINGER, *ESSENTIAL EU LAW IN TEXT* 41 (4th ed. 2018).

¹³ BVerfGE 89, 155, Rn. 103. 英文版翻譯Se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DECISION OF THE GERMA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OCTOBER 12, 1993 IN RE MAASTRICHT TREATY*, <https://iow.eui.eu/wp-content/uploads/sites/18/2013/04/06-Von-Bogdandy-German-Federal-Constitutional-Court.pdf> (last visited May 16, 2022)。

¹⁴ 林春元，全球行政法的發展、功能與侷限——以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體制為例，*月旦法學雜誌*，第283期，頁153-154（2018）。

¹⁵ 前揭註，頁153。Nico Krisch & Benedict Kingsbury, *Introduction*:

之所以將此概念命名為「全球」行政法，而非「國際」行政法，即是為了凸顯此種全球治理體制呈現的是國內和國際管制層面的交織複雜現象，非正式組織亦是多元行政主體的一環，並非傳統意義上僅有的國際法層面¹⁶。

在全球行政法概念下，除了行政管制的發動主體呈現多元化之外，多元行政主體所採取的管制手段和工具也漸趨多元，其不再僅限於帶有強制拘束力的硬法，指導原則、標準等不具有強制拘束力的軟法也成為管制工具的一環¹⁷。更進一步而言，對於硬法和軟法、強制性和自願性規範的界限也日漸模糊，具有指引性、未具強制力的軟法，可能在日後透過成為契約之一部、國內立法的規範，甚而成為解釋法律的依據，而產生類似具有硬法的地位和效果¹⁸。基於上述的轉變，學者Scott提出「後管制國家」(the post-regulatory state)的概念，藉此說明國家不再是當代發動行政管制的唯一主體，和管制工具並非限於制裁和懲罰的性質¹⁹。

在全球行政法的脈絡下，此種呈現多元行政主體，與過去主權國家移轉部分主權，取得其同意之治理體制脫鉤，如何證立其合法性(legality)和正當性(legitimacy)²⁰？前者指涉的是如何辨認「法」的特質，後者則是全球行政法如何發揮其規制和拘束功能。學者Kingsbury提出所謂的「公共性」(publicness)為全球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來試圖解決全球行政法所受到的質疑和挑

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17 EUR. J. INT'L L. 1, 1-2 (2006).

¹⁶ *Id.* at 4-5.

¹⁷ Scott, *supra* note 9, at 149.

¹⁸ Diggs et al., *supra* note 10.

¹⁹ Scott, *supra* note 9, at 173-174.

²⁰ Krisch & Kingsbury, *supra* note 15, at 10-11.

戰。「公共性」(publicness)的概念植基於哈特(H. L. A. Hart)的社會事實概念所發展，其元素包含合法性原則、理性原則、比例原則、法治原則、人權等等，而全球行政法之所以具有「法」的性質，並具有規制和拘束的效力，就是因為受到整個社群所接受，具有公共性的特質²¹。進一步而言，傳統行政法空間是由主權國家所創造出來的，而在Kingsbury所提出的全球行政法空間是分權式的，全球行政法的社會事實概念是在異質性、跨界的管制體制中實踐所創造出來²²。Kingsbury以公共性的概念來一次解決全球行政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問題，也就是說，「公共性」作為辨別全球行政法是否具有「法」的判準，同時也作為全球行政法具有治理正當性的理由。然而，學者郭銘松認為，Kingsbury所主張的「公共性」定義是指受到社會所接受，而發揮行政規制和拘束的規範性效果，但它同時也作為承認全球行政法之所以為「法」的標準，這樣的解方逾越原先哈特對於規則承認和法律規範性要求的嚴格區分²³。然而，亦有學者對於全球行政法的「公共性」提出質疑，在現今許多議題必須放在跨國層次上為處理或討論，不再僅是單一國家內國的問題，況且治理主體不再僅是由傳統主權國家為發動，私人組織亦有可能成為規範制定的主導者，公、私相互交錯且複雜，不再如此容易區分²⁴。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全球行政法所面對的治理正當性的挑戰，具體而言，即是全球行政法框架下的跨國管制體制缺少一個

²¹ Benedict Kingsbury, *The Concept of 'Law' 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20 EUR. J. INT'L L. 23, 31-33 (2009).

²² Ming-Sung Kuo, *The Concept of 'Law' 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A Reply to Benedict Kingsbury*, 20 EUR. J. INT'L L. 997, 1002 (2009).

²³ *Id.* at 1001-1002.

²⁴ Karl-Heinz Ladeur,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and Transnational Regulation*, 3 TRANSNATIONAL LEG. THEORY 243, 256-258 (2012).

可被定義的政治群體所賦予其治理的正當性基礎，本文認為學者 De Búrca 的想法或許可以作為全球行政法所面臨的治理正當性的解方。學者 De Búrca 認為，民主正當性的治理系統的核心在於民主的參與面向，她認為在治理的過程中，社會所有成員擁有平等的機會參與，使其利益能夠擁有相同被納入考量的機會²⁵。在前述的主張之下，她認為參與成員並非固定、靜止不動的，而是持續性地開放和可被修正的²⁶。更進一步而言，全球行政法試圖透過傳統內國行政法所擁有的透明、參與、說理義務等原則拘束全球治理體制，以 De Búrca 所提出的論點而言，前述這些內國行政法所發展出來的原則即是證立跨國治理的正當性基礎來源。

二、全球行政法在企業與人權領域的實踐現況

承接上述所述，在21世紀後，在全球化發展的脈絡下，許多議題無法透過國內法層次為解決，而是屬於跨國性的議題。因各國根據其比較利益發揮其優勢，加入國際生產線，跨國企業（TNC）就此開展不同的經營策略，將其生產鏈重組及佈局，進而產生涉及跨國的人權保障爭議即是屬於這樣的議題之一。如前言所提及，許多已開發國家的企業母公司，利用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法律制度和管制標準的落差，規避母國較為嚴格的標準，導致企業母國境外發生人權侵害、環境污染等事件，在此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逐漸成為重要的議題。鑑於跨國企業的生產網絡建立伴隨著人力、資金、服務的流動，跨國治理在企業與人權的領域為重要特徵，也因此特殊性，全球行政法的管制模式在此領域更具明顯，發動管制的主體及管制工具也呈現多元的樣貌，發展出多層次且

²⁵ Gráinne de Búrca, *Developing Democracy Beyond the State*, 46 COLUM. J. TRANSNAT'L L. 221, 252 (2008).

²⁶ *Id.* at 253-254.

複雜的治理體系。

本文將在此部分，首先將以規範制定主體區分為自律組織和國際組織，在自律組織，主要以私人金融機構所發動制定的赤道原則為介紹，而在國際組織制定規範方面，首先介紹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制訂的跨國企業指導綱領以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之《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雖然其皆屬於未具有強制力的軟法，然率先揭示企業必須保障人權的價值，並說明企業盡職調查的義務以及跨國公司母國所應盡的責任內容，成為後續許多國家制定內國法的參考依據。又2017年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第24號一般性意見書特別針對跨國公司母國的域外義務面向為說明，為規範國家義務的重要指標所在。

此外，因近年歐盟以推動永續發展為主要政策目標，並在2019年公布歐盟綠色政綱（EU Green Deal），強調綠色經濟的重要性，在此框架下，歐盟亦發布歐盟投資者揭露規則、歐盟分類規則（the EU Taxonomy Regulation）、歐盟非財務資訊揭露指令（EU 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 NFRD），即是落實《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以及OECD要求盡職義務的精神，因此本文將以歐盟層次在此範圍內的相關規範作為研究範圍，以規制跨國企業至境外投資的相關規範來進行說明和介紹，藉此觀察全球行政法在企業與人權領域的實踐現況和治理現象。

（一）國際組織

1.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之《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以企業與人權領域為例，在2011年6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全體無異議地通過《聯合國企

業與人權指導原則》(the United Nations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UNGPs)，揭示對於企業與人權保障的價值，該指導原則一體適用於所有國家和企業類型，其架構主要立基於三大主要方向：(1) 國家保護義務：國家有義務尊重、保障和實踐人權和基本自由；(2) 企業尊重人權：企業在社會中扮演特殊的角色，被要求必須遵守可適用的法律和尊重人權；(3) 權利有效救濟：當權利受到侵害時，必須提供適當且有效的救濟²⁷。

此外，從《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第17條至21條臚列企業應履行人權盡職調查義務的內容，包括像是對於實際和潛在的人權影響進行評估，並進一步根據評估報告有所行動（第17條）、人權盡職調查必須與潛在受影響的團體或相關的股東進行溝通（第18條）等，換言之，《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規定人權盡職調查義務的發動主體為私人企業本身²⁸。又《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亦規範跨國公司的母國應採取適當的步驟

²⁷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HR/PUB/11/04, at 1 (2001)

These Guiding Principles are grounded in recognition of:

- (a) States’ existing obligations to respect, protect and fulfil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 (b) The role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as specialized organs of society performing specialized functions,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all applicable laws and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 (c) The need fo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o be matched to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remedies when breached.

²⁸ Ionel Zamfir, Toward a Mandatory EU System of Due Diligence for Supply Chains,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59299/EPRS_BRI\(2020\)659299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59299/EPRS_BRI(2020)659299_EN.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提供國內有效的司法救濟途徑以及其他申訴管道（第26、27條）。

《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清楚地揭示企業必須尊重人權。雖然該指導原則沒有法律拘束力，然而在國際上被認為具有「全球指標性尊重商業與人權的文件」²⁹。特別要說明的是，《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所揭示的盡職調查義務具有以下特色：（1）盡職調查所應調查的風險範圍並非對於企業本身的風險，而應該聚焦在其他面向的風險；（2）盡職調查的範圍不應該僅止於風險辨認，更應該包括風險預防和減輕，即係指應包括將盡職調查的結果與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溝通，此種外部的溝通更是促進透明和課責性的核心所在³⁰。

2.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所制訂的跨國企業指導綱領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1976年提出跨國企業指導綱領，雖然其並不具有強制拘束力，然而採納該指導綱領的國家，透過指定其國內的主管機關（National Contact Points）負責協助並監督國內企業落實該指導綱領³¹。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2011年修正該指導綱領，主要增加保障人權之章節，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之《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的國家保護義務、企業尊重人權、權利有效救濟三大主要支柱納入其中³²。此外，在2011年版本的指導綱領中，建議企業應該盡其人權盡職調查的義務，強調盡職調查的內容包括評估實際和潛在的人權風險影響，並且針對

²⁹ Lindsay et al., *Hardly Soft Law: The Modern Slavery Act 2015 and the Trend Towards Mandatory Reporting on Human Rights*, 18 BUS. L. INT'L 29, 45 (2017).

³⁰ *Id.* at 47.

³¹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EDITION 3 (2011).

³² *Id.*

調查的結果採取行動以達減輕風險的目的，並試圖針對這些風險進行溝通等³³。

2011年版本的跨國企業指導綱領有下列特色：(1) 此為第一次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透過其文件，將商業行為與人權要求連結在一起³⁴；(2) 在社會企業責任的框架下，此版本不僅關注母公司商業行為本身，更將焦點範圍擴及生產供應鏈上的供應商等商業行為³⁵；(3) 明確指出和強化指導綱領的執行和落實程序，例如在指導綱領即明確建議可透過國際仲裁途徑，試圖解決企業與地主國之間的糾紛等³⁶；(4) 清楚指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定位，在於協助各國內主管機關落實該指導綱領，協助其處理公司與利害關係人之糾紛³⁷。

3. 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第24號一般性意見書：國家域外義務

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下稱經社文公約）第24號一般性意見之前身《關於國家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領域的域外義務的馬斯垂克原則》（Maastricht Principles on Extraterritorial Obligations of States in the area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以下簡稱《馬斯垂克原則》），此為2011年9月28日國際法和人權法相關的專家學者針對經社文公約的國家域外義務適用問題為研討，進而通過《馬斯垂克原則》，為日後經社文公約第24

³³ *Id.* at 34.

³⁴ Ashley L. Santner, *A Soft Law Mechanism fo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How the Update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Promote Business for the Future*, 43 GEO. WASH. INT'L L. REV. 375, 383 (2011).

³⁵ *Id.* at 384.

³⁶ *Id.* at 384. OECD, *supra* note 31, at 18.

³⁷ *Id.* at 384-385. OECD, *supra* note 31, at 75.

號一般性意見下基礎。

2017年，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增加了第24號一般性意見書「在商業行為背景中關於國家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負的義務」，特別提及全球供應鏈的形成，跨國企業跨國境的活動日益增加，締約國必須負起域外義務，採取適當的步驟防止跨國企業在境外發生人權侵害的行為³⁸。具體而言，國家必須要求在設立於境內或管轄範圍內的公司盡其查明義務，防止其設於境外的子公司出現侵害人權的行為³⁹。若該侵害行為在合理情況下能預見，國家卻未採取一定的措施防止其發生，國家即違反注意義務，必須承擔一定的責任⁴⁰，為確保有效預防境外人權侵害行為的發生，國家必須建立適當的監測和課責機制⁴¹。在第24號一般性意見書裡，亦揭示國家對於境外人權侵害行為的可能採取的管制工具，例如：國家無須直接對企業課予義務，反而透過對於徹底落實人權監督機制的企業給予獎勵、提供經濟誘因的管制方式，以具體落實境內、境外的人權⁴²；國家應制定強制揭露的法律，要求企業提供相關資訊，若企業未提供資訊說明其投資行為可能造成的風險，或是未採取相應的措施以避免風險發生，國家亦可考慮透過行政罰的手段，或是將此企業的揭露和說明作為把關投資出口信貸門檻之一，若未履行前揭義務，國家可為否准之決定等⁴³。

³⁸ 法務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般性意見第24號一般性意見，頁389，法務部，修訂2版（2018）。

³⁹ 前揭註，頁392。

⁴⁰ 法務部，前揭註38，頁391-392。

⁴¹ 法務部，前揭註38，頁392。

⁴² 法務部，前揭註38，頁391。

⁴³ 法務部，前揭註38，頁395-596。

4. 歐盟層次

(1) 歐盟衝突礦產規則 (Conflict Minerals Regulation)

歐盟在2017年5月通過歐盟衝突礦產規則⁴⁴，此規則於2021年1月1日起生效實施，此特色在於要求進入歐盟市場的進口商必須確實盡其盡職調查的義務，迫使進口商不得不重視此議題和尊重人權的價值。此規則制定的立法背景在於歐盟市場中所使用的手機或是車輛等電子產品中的零件包含錫 (tin)、鉭 (tantalum)、鎢 (tungsten)、金 (gold) 等「衝突礦產」，長期以來為中非國家及周邊武裝叛亂團體購買武裝設備的財源所在，使得這些武裝叛亂團體有足夠的資源為人權侵害的行為⁴⁵。

為了避免歐盟成為資助武裝叛亂團體，進而成為人權侵害的直接或間接的加害者，因此歐盟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所發布的「針對來自受影響或高風險地區礦產供應鏈之盡職調查準則」(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of Minerals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自願性準則納入此規則⁴⁶，賦予歐盟進口商必須強制為盡職調查的義務。具

⁴⁴ Regulation (EU) 2017/82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May 2017 laying down supply chain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for Union importers of tin, tantalum and tungsten, their ores, and gold originating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2017 O.J. (L 130)1.

⁴⁵ EUROPEAN COMMISSION, CONFLICT MINERALS REGULATION: THE REGULATION EXPLAINED,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development-and-sustainability/conflict-minerals-regulation/regulation-explained_en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⁴⁶ Regulation (EU) 2017/82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May 2017 laying down supply chain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for Union importers of tin, tantalum and tungsten, their ores, and gold originating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2017 O.J. (L 130)1, 1: “The Union has been actively engaged in an

體而言，要求歐盟進口商必須建立起其管理機制去確認和評估在生產供應鏈上的風險（第4條），進口商本身必須針對這些風險擬定策略為因應（第5條）⁴⁷。此外，進口商公司內部也必須徹底建立由獨立、第三方所為的供應鏈盡職調查的監督機制（第6條），並且必須每年提出相關報告（第7條）⁴⁸。透過此規則的制定，歐盟進口商必須確保它們所購買的礦產原料並未進一步造成衝突、剝削勞工或其他非法活動等情形產生，企圖透過該規則的制定，促使歐盟進口商正視人權侵害的問題，重視企業與人權的價值。

（2）歐盟綠色政綱（EU Green Deal）框架下，要求企業揭露相關資訊之歐盟規範

近年歐盟以推動永續發展為主要政策目標，並在2019年公布歐盟綠色政綱（EU Green Deal），強調綠色經濟的重要性，在此框架下，歐盟公布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則（The EU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歐盟永續分類規則（The EU Taxonomy Regulation）。歐盟執委會於2021年4月提出歐盟企業永續揭露指令草案（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 CSRD），預計將修正目前的歐盟非財務資訊揭露指令（EU Non-

initiativ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o advance the responsible sourcing of minerals from conflict areas,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government-backed multi-stakeholder process leading to the adoption of the 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of Minerals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including the Annexes and Supplements thereto. In May 2011, the OECD Ministerial Council recommended the active promotion of the observance of that Guidance.” 林孝哲、黃雯郁，試析歐盟衝突礦產規則於WTO協定下之適法性爭議，經貿法訊，第239期，頁10（2018）。

⁴⁷ Zamfir, *supra* note 28.

⁴⁸ Zamfir, *supra* note 28.

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 NFRD)。

歐盟於2019年通過Regulation (EU) 2019/2088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則 (SFDR)，2021年3月開始生效。該規則的目的在於增加金融市場對於永續性的透明度，促使金融業或財務顧問揭露涉及永續因素的資訊，強制要求金融業必須在企業本身 (第3-6條) 以及產品 (第7-11條) 等兩個層面，分別揭露兩個層面的永續性風險 (Sustainability Risk)、主要的不利影響 (Principal Adverse Impacts)，以及其他具有影響性的因素⁴⁹。透過揭露上述資訊，提供投資者能夠正確地選擇和評估負有社會企業責任和值得信賴的投資，以避免「漂綠」(Greenwashing) 投資的產生。

歐盟於2020年6月通過Regulation (EU) 2020/852歐盟永續分類規則，2020年7月開始生效。該規則的核心特色在於試圖為歐盟會員國成員制定統一的評估企業每一項的經濟活動是否該當所謂環境永續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程度的具體標準，四大標準如下：1.對於減緩氣候變遷、適應氣候變遷、永續使用和保護水和海洋資源、發展循環經濟、污染預防和防治、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保護和修復等其一或是更多項目的環境目標作出相當的貢獻；2.對於其他的環境目標不會造成重大的傷害；3.符合最低的人權保障標準，確保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制訂的跨國企業指導綱領、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國際勞工組織制訂的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規範；4.符合技術性篩選標準 (第3條)⁵⁰。目前歐盟永續分類規則是制定原則性的框架標準，仍有許多

⁴⁹ 請參照林士傑，國際ESG風險與監理趨勢及銀行業永續金融發展商機，銀行公會會訊，第123期，頁3-5 (2021)。

⁵⁰ Regulation (EU) 2020/852, art. 3, 2020 O.J. (L 198)13, 27: “For the purposes of establishing the degree to which an investment is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an economic activity shall qualify as

技術性的事項待後續授權的施行細則來具體規範。近期亦有呼聲倡議歐盟永續分類規則不應該只是將焦點放在環境面向，而必須進一步延伸至社會性和保障人權指標方面⁵¹。

歐盟於2014年通過Directive 2014/95/EU歐盟非財務資訊揭露指令，係修正歐盟2013/34/EU關於財務報告指令的內容⁵²，適用範圍為員工超過500名的公司，對其課予揭露義務，說明與供應商、外包商的連結關係，並要求提供公司採行盡職調查的程序方法，說明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勞工待遇、尊重人權、反賄賂和貪腐等資訊，以達到辨認、預防和減輕既存和潛在的負面影響⁵³，換言之，藉由非財務資訊揭露，讓人們能夠獲取其何以受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where that economic activity: (a) contributes substantially to one or more of the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set out in Article 9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s 10 to 16; (b) does not significantly harm any of the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set out in Article 9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7; (c) is carried ou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minimum safeguards laid down in Article 18; and (d) complies with technical screening criteria that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Commissio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0(3), 11(3), 12(2), 13(2), 14(2) or 15(2).”

⁵¹ FINANCIAL STABILITY,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APITAL MARKETS UNION, PLATFORM ON SUSTAINABLE FINANCE’S DRAFT REPORT ON A SOCIAL TAXONOMY,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business_economy_euro/banking_and_finance/documents/sf-draft-report-social-taxonomy-july2021_en.pdf (last visited Sep. 20, 2021).

⁵² Directive 2014/95/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October 2014 amending Directive 2013/34/EU as regards disclosure of non-financial and diversity information by certain large undertakings and groups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2014 O.J. (L 330)1.

⁵³ *Id.* at 2: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nsistency and comparability of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ed throughout the Union, certain large undertakings should prepare a non-financial statement containing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at least environmental matters, social and employee-related matters,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ti-corruption and

公司經營模式影響的相關資訊，以及讓股東能夠要求經營者對於公司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負責⁵⁴。

歐盟非財務資訊揭露指令的公布和制定，可視為從私領域、自願性的架構轉變為公領域、強制性的管制體制⁵⁵，該指令讓各公司擁有自由裁量權選擇其資訊揭露的義務內容和範圍，乃立基於「遵守，要不解釋」(comply or explain)的規範原則，也就是說，一家公司如果不願意揭露其社會和環境的相關活動，必須於報告中清楚地說明理由，否則即必須受處罰⁵⁶。

bribery matters. Such statement should include a description of the policies, outcomes and risks related to those matters and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management report of the undertaking concerned. The non-financial statement should also include information on the due diligence processes implemented by the undertaking, also regarding, where relevant and proportionate, its supply and subcontracting chains, in order to identify, prevent and mitigate existing and potential adverse impacts. It should be possible for Member States to exempt undertakings which are subject to this Directive from the obligation to prepare a non-financial statement when a separate report corresponding to the same financial year and covering the same content is provided.”

陳麗娟，EU公司治理下企業社會責任之研究，月旦財經法雜誌，第39期，頁64（2016）。

⁵⁴ Maddalena Neglia, *The UNGPs—Five Years on: From Consensus to Divergence in Public Regulation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34 NETHERLANDS QUARTERLY OF HUMAN RIGHTS 289, 305 (2016).

⁵⁵ W. Gregory Voss, *The European Union's 2014 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 Mandatory Ex Post Disclosure-But Does It Need Improvement?*, in: AMISSI MELCHIADE MANIRABONA & YENNY VEGA CÁRDENAS EDS.,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HUMAN RIGHTS IN AN ERA OF GLOBAL JUSTICE: NEW WAYS OF RESOLVING AND PREVENTING CONFLICTS* 362 (2019).

⁵⁶ Nora Hahnkamper-Vandenbulcke, *Briefing Implementation Appraisal 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54213/EPRS_BRI\(2021\)0010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54213/EPRS_BRI(2021)0010_EN.pdf).

為了達成歐盟綠色綱領的目標，歐盟執委會在2021年4月提出歐盟企業永續揭露指令草案，預計將修正目前的歐盟非財務資訊揭露指令，將適用範圍擴及至所有大型和上市公司，不再僅侷限於先前適用於員工超過500名的上市公司，並因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則、歐盟永續分類規則的公布，能對於相關的揭露規範進行修正，以達與上述規則標準一致⁵⁷。

（二）自律組織

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管制的發動者不僅來自於國家，有時也會由市場中的私人行動者所提供。相較於行政管制，自律組織所為之管制是否為有效的選擇？對於自律管制的批評無非基於以下幾點：1. 自利（self-interest）對於公司或企業來說是最大的驅動力，對於他們如何制定相關自律規範而能補充既有的行政管制規範並不清楚；2. 在自律管制的框架下，有許多企業或公司可能會搭便車（free-ride），或是根本沒有留意到自律規範的存在，導致規制效果不彰；3. 相較於行政管制，自律規範通常都採取較低的標準，且其主要的制定目的為搶先國家在於該事務領域的管制地位⁵⁸。然而，有些自律規範的制定透過認證的方式，提供企業或公司加入該自律規範或準則的誘因，提高其品牌商譽和形象，進而達到規制的效果⁵⁹。

1)654213_EN.pdf (last visited Sep. 20, 2021). Neglia, *supra* note 54.

⁵⁷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mending Directive 2013/34/EU, Directive 2004/109/EC, Directive 2006/43/EC and Regulation (EU) No 537/2014, as regards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COM(2021) 189 final (Jan. 4, 2021).

⁵⁸ Karsten Ronit, *Organized Business and Global Public Policy: Administ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Regulation*, in: DIANE STONE & KIM MOLONE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POLICY AND TRANSNATIONAL ADMINISTRATION* 565, 577 (2019).

⁵⁹ *Id.* at 578.

企業與人權領域中，由世界銀行集團所屬的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召集荷蘭銀行（ABN AMRO）、花旗銀行（Citigroup）、巴克萊銀行（Barclays）、和西德意志州立銀行（West. LB）等私人銀行草擬「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EPs），並於2003年提出，要求扮演資金提供者的金融機構必須負起企業社會責任，特別針對借貸方向金融機構申請在開發中國家為開發投資計畫之專案融資時擔任把關的角色，將環境與社會影響的評估納入審核融資的標準⁶⁰。起初，只要專案最低融資門檻達到5,000萬美金，就會列入風險審查，當專案投資計畫被認為可能造成顯著的風險，即被要求提高環境和社會風險資訊的揭露和報告標準⁶¹。2006年赤道原則進行修正，推出第二版，適用赤道原則專案的最低融資門檻從5,000萬美元降低至1,000萬美元，並且導入與專案相關的利害關係人的磋商機制⁶²。2013年6月赤道原則第三版的內容則是增強借款方對於環境和社會風險評估為盡職調查的義務⁶³。赤道原則雖然是由私人金融機構所建立，但從2013年發展迄今，已逐漸成為國際各金融機構自願遵循之準則，金融機構承諾負起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對於欲融資方的專案進行環境或社會風險的評估審查，進一步促使企業或公司落實和遵循環境保護和人權保障的價值和標準，發揮規制效果的準則。

⁶⁰ Joshua A. Lance, *Equator Principles III: A Hard Look at Soft Law*, 17 N.C. BANKING INST. 175, 180 (2013). Niamh O’Sullivan & Brendan O’Dwyer,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on a Financial Sector Legitimation Process: The Case of NGOs and the Equator Principles*, 22 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 553, 563-564 (2009).

⁶¹ Lance, *id.*, at 181.

⁶² Lance, *supra* note 60, at 184. 張蕙嫻，赤道原則之現況，銀行公會會訊，第88期，頁8（2015）。

⁶³ 張蕙嫻，前揭註，頁9。

接下來於第參部分，探討各國將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落實於內國法律層次中，從軟法的指引內化為內國硬法的層次。

參、帶有域外影響的內國管制法律 (Transnational State Legislation) 的出現

《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皆是各國應明確要求在管轄範圍內註冊的企業公司必須在營運過程尊重人權，且各國必須採取措施避免人權侵害情況發生（第1-2條）。為回應和符合上述的要求，有些國家採取直接具有域外效力的立法和執法架構（direct extraterritorial legislation and enforcement），例如針對部分犯罪，若犯罪行為人為母國人，無論其犯罪地在母國或是境外，皆適用母國之刑法⁶⁴；有些國家則是透過制定帶有域外影響的內國管制法律（domestic measures with extraterritorial implications）⁶⁵，更具體而言，即所謂管制域外行為的內國立法（Transnational State Legislation）⁶⁶，由國家強制要求跨國企業負有一定的揭露資訊義務，以落實企業與人權精神。因跨國企業所產生人權侵害而衍生的刑事追訴並非本文所要處理的範圍，而是聚焦在國家對於跨國企業在落實人權保障的管制措施。

《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第17-21條）中將人權盡職

⁶⁴ 例如我國刑法第7條採屬人原則：「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

⁶⁵ John Ruggie,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A/HRC/17/31, at 7 (Mar. 21, 2011).

⁶⁶ Phillip Paiement, *Transnational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 and the Law*, in: PEER ZUMBANSE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RANSNATIONAL LAW* 838 (2021).

調查義務規範由公司本身自願來發動，然而這樣的規範模式遭受許多批評，原因在於許多公司現實上根本不願意主動來進行人權盡職調查⁶⁷。有鑑於此，目前許多國家的立法規範模式逐漸將此盡職調查義務定性為強制性⁶⁸，此現象從歐洲各國近期紛紛制定所謂帶有域外影響的內國管制法律（domestic measures with extraterritorial implications）可見端倪⁶⁹。例如逐漸將指引或指導

⁶⁷ Anne Van Schaik & Lucia Ortiz, 5 Years of Failure - Why UN Voluntary Measures Aren't Stopping Bad Business Behavior, Common Dreams, <https://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16/06/15/5-years-failure-why-un-voluntary-measures-arent-stopping-bad-business-behavior>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⁶⁸ Zamfir, *supra* note 28. 例如，2015年於英國實施生效的英國當代奴隸法（UK Modern Slavery Law）即要求英國境內的公司必須向大眾揭露其全球生產供應鏈中的現代奴隸或是人口販運的情況；而荷蘭則是通過所謂的盡職調查童工法（Dutch Child Labor Due Diligence Law, [Wet Zorgplicht Kinderarbeid]），強制荷蘭境內的公司必須對於生產供應鏈上有無雇用童工的情況為盡職調查，該法預計於2022年實施生效。德國亦於2021年6月11日通過供應鏈企業責任法，規定從2023年起，在德國境內員工人數超過3,000人的企業（包括外國企業在德國境內設立的分公司）必須對其供應鏈中的人權問題以及環境影響為盡職調查，中文介紹請參照傅佩芬，*打造永續經營，全民共享的供應鏈——從德國《供應鏈企業責任法》談起*，思想坦克，<https://voicetank.org/%E6%89%93%E9%80%A0%E6%B0%B8%E7%BA%8C%E7%B6%93%E7%87%9F%E5%85%A8%E6%B0%91%E5%85%B1%E4%BA%AB%E7%9A%84%E4%BE%9B%E6%87%89%E9%8F%88%E5%BE%9E%E5%BE%B7%E5%9C%8B%E4%BE%9B%E6%87%89%E9%8F%88%E4%BC%81%E6%A5%AD%E8%B2%AC%E4%BB%BB%E6%B3%95%E8%AB%87%E8%B5%B7/>（2021/06/16，最後更新日）。

⁶⁹ 本文在此是想說明在企業與人權的領域中，出現許多國家為回應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於內國制定帶有域外影響，並具有強制力法律的趨勢。原先本文是採用「跨國永續法律」（transnational sustainability law）一詞，然經審查人提醒，此一用語並非完全指涉內國強制力的法律，涵蓋範圍更包括國際法層次等標準，因而本文採用「帶有域外影響的內國管制法律」（domestic measures with

原則具體化為國內法規，似乎顯示在企業與人權的領域，發動管制的對象逐漸從私人標準、國際法指導原則轉向國內法發展，其性質由軟法轉為硬法的趨勢⁷⁰。更具體而言，在全球化之下，本以規制內國管制為目的之行政法，重新定位並出現新的面貌，逐步回應具跨國特性之議題。

鑑於我國「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內容包括「我國企業在境外造成人權侵害」及「在我國境內實施商業活動的外國跨國企業於我國造成人權侵害」的議題⁷¹，本文在此部分，就上開不同的規範主體，在比較法之經驗上，分別選擇較具示範性和指標意義的兩部法律為主要研究對象：法國於2017年所公布的企業警戒法（Duty of Vigilance law, La loi sur le devoir de vigilance）為全世界率先突破跨國公司的面紗，要求母公司必須對其在境外的子公司，甚至是生產鏈上的承包商、供應商在境外的環境污染或是人權侵害行為負責，成為歐洲各國參考的修法版本，而英國當代奴隸法（UK Modern Slavery Law）則是處理全球化生產供應鏈上，針對外國跨國企業於英國境內實施商業活動的相關規範。以下本文將說明英國當代奴隸法、法國企業警戒法，最後一併談及目前歐盟在企業與人權此領域的最新立法情況，期望能對於我國未來於管制跨國企業法制上給予一點啟發。

extraterritorial implications) 來說明上述所欲說明的現象。在此感謝審查人的提醒。

⁷⁰ Jaakko Salminen & Mikko Rajavuori, *Transnational Sustainability Laws and the Regul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Comparison and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26 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 602, 610 (2019).

⁷¹ 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臺灣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 落實「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行政院全球資訊網，<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de53d248-0b06-4b3e-8554-77068fee1a74>（2020/12/10，最後更新日）。

一、英國當代奴隸法（UK Modern Slavery Law 2015）

（一）適用主體及範圍

英國當代奴隸法於2015年實施生效，主要針對兩種犯罪類型為規範：其一為奴隸、奴役、強迫和強制勞動（*Slavery, servitude and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r*），另一為人口販運（*Human trafficking*）⁷²。又，該法第54條要求於英國境內從事商業活動的公司必須對於全球生產供應鏈有無上述犯罪行為負起揭露義務，更進一步而言，此規範的適用對象為無論其公司的註冊地為何，只要在英國境內從事商業活動，且年營業額達3,600萬英鎊以上的公司⁷³，皆必須在每個會計年度提出一份確保在其商業活動或是生產供應鏈上無任何奴隸或是人口販運情形的聲明（*a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statement*）⁷⁴。

⁷² Modern Slavery Act 2015, c. 30, § 1 (UK): “A person commits an offence if — (a) the person holds another person in slavery or servitude and the circumstances are such that the person knows or ought to know that the other person is held in slavery or servitude, or (b) the person requires another person to perform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ur and the circumstances are such that the person knows or ought to know that the other person is being required to perform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ur.”

⁷³ 當代奴隸法並未規範年營業額的數值，而授權予內政大臣發布所謂的行政命令訂定之。See GOV.UK, STATUTORY GUIDANCE, TRANSPARENCY IN SUPPLY CHAINS: A PRACTICAL GUID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ransparency-in-supply-chains-a-practicalguide/transparency-in-supply-chains-a-practical-guide>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⁷⁴ Modern Slavery Act 2015, c. 30, § 54 (4) (UK): “A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statement for a financial year is — (a) a statement of the steps the organisation has taken during the financial year to ensure that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is not taking place — (i) in any of its supply chains, and (ii) in any part of its own business, or (b) a

（二）法定義務

此聲明的內容必須包括該公司的組織架構、商業活動內容及其生產供應鏈；對於打擊奴隸和人口販運的內部政策；對於在商業活動和生產供應鏈所採取的盡職調查程序；指出在商業活動和生產供應鏈中所可能產生的風險所在，並提出評估和管控此風險的步驟；說明適用於評估該公司確保其商業活動或生產供應鏈不發生奴隸和人口販運的績效指標的有效性；公司針對提升打擊奴隸和人口販運意識的職業訓練內容⁷⁵。而當代奴隸法規定內政大臣（the Secretary of State）針對如何實行該揭露義務規定必須發布進一步的具體規範指引⁷⁶。然而，對於那些未揭露的公司，除了賦予內政大臣可以向法院提起禁制令，強制公司為履行之外，當代奴隸法中未有相應處以罰金等相關規定⁷⁷。

75 statement that the organisation has taken no such steps.”
Modern Slavery Act 2015, c. 30, § 54 (5) (UK): “An organisation’s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statement may include information about — (a) the organisation’s structure, its business and its supply chains; (b) its policies in relation to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c) its due diligence processes in relation to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in its business and supply chains; (d) the parts of its business and supply chains where there is a risk of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taking place, and the steps it has taken to assess and manage that risk; (e) its effectiveness in ensuring that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is not taking place in its business or supply chains, measured against such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s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f) the training about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available to its staff.”

76 Modern Slavery Act 2015, c. 30, § 54 (9) (UK):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a) may issue guidance about the duties imposed on commercial organisations by this section; (b) must publish any such guidance in a wa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considers appropriate.”
GOV.UK, *supra* note 73.

77 Modern Slavery Act 2015, c. 30, § 54 (11) (UK): “The duties imposed on commercial organisations by this section are enforceable by the

（三）最新修正草案的提出

在目前的版本中，對於未符合法定義務要求的企業，並未有相應的刑事責任。2021年6月，議員針對英國當代奴隸法提出修正草案的版本，展現對於企業與人權的重視和關注，以及加強管制的強度。修正草案主要針對以下兩種違法行為予以刑事制裁，包括企業負責人明知或輕率的情況下，知聲明內容為不實或不完整仍提供，以及在反奴隸獨立委員為正式警告之後，供應商或其次級供應商仍無法符合最低透明度的標準。此外，該草案版本亦針對揭露和透明度制定新的規定包括必須公布生產供應鏈上所採購物品原產國的資訊、企業必須安排第三方的外部抽查和外部審計，以及必須揭露生產供應鏈上使用代表海外政府的職業介紹仲介資訊⁷⁸。

二、法國企業警戒法（Duty of Vigilance Law, La loi sur le devoir de vigilance）

在全球性跨國產業生產鏈中，所面臨的問題是，跨國企業集團中的每個公司都被假定為是具有獨立的法人格，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公司，可能受到不同管轄權所管轄。因此，在上述的前提之下，母公司和外包商並不需要為其子公司或受其控制的子公司所為的境外環境和人權侵害行為負責。又，關於管制跨國企業在境外所引發的環境污染或是人權侵害問題的規範，似乎皆處於國際法層次上的規範，皆是屬於軟法性質，並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導致無法強制性地課予跨國企業義務或是對於這些造成人權

Secretary of State bringing civil proceedings in the High Court for an injunction or, in Scotland, for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a statutory duty under section 45 of the Court of Session Act 1988.” Virginia Mantouvalou, *The UK Modern Slavery Act 2015 Three Years on*, 81 THE MODERN LAW REVIEW 1017, 1039 (2018).

⁷⁸ Modern Slavery (Amendment) Bill 2021-22, HL Bill [32] (UK).

侵害的跨國企業進行咎責。因此，制定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規範是必要且迫切的課題。

法國企業警戒法即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應運而生，前言即明確指出該法的制定是將《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所要求的人權盡職調查義務具體落實⁷⁹，同時也實踐《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24號一般性意見書的精神。

促使法國制定企業警戒法之背景在於2013年4月24日孟加拉的熱那大廈（Rana Plaza）倒塌，這棟大廈是許多歐洲知名服務品牌代工廠的所在地，此倒塌事件造成約一千多人死亡，傷者也不在少數。此事件發生之後，許多服裝品牌的母公司否認與該代工廠的關係，也激起外界對於服飾業在全球生產供應鏈中血汗工廠和勞動條件的關注，引發跨國企業中母公司是否對於供應鏈上的人權問題為盡職調查和負責的討論⁸⁰。以下將介紹法國企業警戒法的內容⁸¹：

（一）適用主體和範圍

根據法國企業警戒法第1條，法國企業警戒法的規範主體為1. 設立在法國、在法國境內擁有超過5,000名的員工的公司，或是2. 上述公司本身或受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公司，其在全世界的員工

⁷⁹ Actionaid et al., *The Law on Duty of Vigilance of Parent and Outsourcing Companies Year 1: Companies Must Do Better*, RESPECT International, <https://respect.international/wp-content/uploads/2019/06/Companies-Must-Do-Better.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⁸⁰ ASSEMBLÉE NATIONALE, *PROPOSITION DE LOI RELATIVE AU DEVOIR DE VIGILANCE DES SOCIÉTÉS MÈRES ET DES ENTREPRISES DONNEUSES D'ORDRE*, <https://www.assemblee-nationale.fr/14/propositions/pion2578.asp>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⁸¹ *Id.*

超過10,000名⁸²。又關於適用範圍，法國企業警戒法明文規定所適用的公司活動，及其商業關係。該法律所適用的公司活動範圍有：1.母公司的活動本身；2.依據法國商法典第233條之16第2項規定，直接或間接受母公司所控制（例如：直接或間接握有多數的投票權利；連續兩個財政年度指定多數的管理層級成員、管理或是監督團隊，或是透過契約或是法律明訂條文對該公司具有支配的影響力）；3.母公司的承包商或是供應商，且兩者之間的關係該當法國法上所謂的「商業關係」（an ‘established business relationship’），包括在有契約或是無契約之下建立穩定且常態化的商業關係，擁有一定程度的交易數量，且也創造了一個合理的期待⁸³。

（二）法定義務

法國企業警戒法是法國第一部要求法國企業必須針對其商業行為進行人權盡職調查（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的法律，而這項義務也擴及他們的子公司和供應鏈，法國企業警戒法將目前《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入法，要求法國企業必須履行人權盡職調查的責任。根據法國企業警戒法規定，公司必須制定「警戒計畫」（Vigilance plan），且必須有效地執行。「警戒計畫」的內容包括：1.風險地圖（A risk mapping）；2.評估程序

⁸² de la loi n° 2017-399 du 27 mars 2017 relative au devoir de vigilance des sociétés mères et des entreprises donneuses d'ordre, [Law 2017-399 of March 27, 2017 French Corporate Duty of Vigilance Law],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J.O.] [Official Gazette of France], Mar. 28, 2017, art. 1. English version: French Corporate Duty of Vigilance Law (English Translation) European Coalition of Corporate Justice, 2016, RESPECT International, <http://www.respect.international/french-corporate-duty-of-vigilance-law-english-translation/> (last visited Mar. 31, 2021).

⁸³ *Id.*

(Assessment procedures)；3.減低風險行動計畫 (Risk mitigation actions)；4.警戒或陳報機制 (An alert or reporting mechanism)；5.監督機制去評估警戒計畫中所採取的措施的有效性 (A monitoring mechanism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measure taken under the plan)。法國最高行政法院 (the Conseil d'état) 發布的法令可以擴大警戒計畫的內容和範圍⁸⁴。

(三) 救濟途徑

根據法國商法典第L.225-102-4條規定，在寄送正式要求三個月之後，任何利害關係人可以要求公司履行法定義務要求。如果公司在一定期限內不履行，任何利害關係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要求公司必須遵守法律，並且必要時藉由罰金的方式要求企業履行相關義務。

目前依法國企業警戒法所提起的訴訟共有兩起，被告皆是道達爾 (Total) 公司。第一起訴訟由法國地球之友組織和烏干達 NGOs 所提起，原告主張道達爾所提出的警戒計畫並未符合法國企業警戒法的規定，導致烏干達的人民人權受到侵害，具體而言，大約5,000名的烏干達人民其土地遭到徵收，但因未得到足夠的賠償導致其流離失所的情況，因而向南特地方法院 (the Nanterre Civil Court of Justice, Le Tribunal Judiciaire De Nanterre) 提起訴訟⁸⁵。然而，被告道達爾主張關於法國企業警戒法規範公司擬定和執行警戒計畫的法定義務與公司治理有直接關聯，應屬於商事法院所管轄之事項，南特地方法院也接受被告之主張，認為該案件非其所轄，因而於2020年1月30日駁回訴訟。原告不服，上訴至凡爾賽上訴法院 (Versailles Court of Appeal)，凡爾賽

⁸⁴ *Id.*

⁸⁵ Tribunal Judiciaire De Nanterre [TJN] [Nanterre Civil Court of Justice] Nanterre, civ., Jan. 30, 2020, 19/02833.

上訴法院維持一審見解，認為該案件應由商事法院審理，駁回原告之訴⁸⁶。

第二起訴訟則是由14個地方政府和5個NGOs（Notre Affaire à Tous, Sherpa, France Nature Environnement, Eco Maires and ZEA）於2020年1月28日向南特地方法院所提起，主張道達爾未依法國企業警戒法的規定，報告與其商業活動有關的環境影響風險因素，亦未採取適當措施以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而導致侵害人權、健康和環境影響的情形產生，要求法院必須強制道達爾針對環境影響採取一定的因應措施，這也是法國所提起針對氣候變遷所提起的第一起訴訟⁸⁷。2021年2月11日南特地方法院肯認其對該起事件具有管轄權⁸⁸。

從上可知，同樣依據法國企業警戒法所提起之爭訟，但系爭事件究竟歸屬於何法院卻有不同見解，凸顯出現行法國企業警戒法未有管轄權之相關規定，而導致管轄權歸屬之爭議。針對原告依法國商法典第L.225-102-4條和第L.225-102-5條向法院提起涉及法國企業警戒法爭議的爭訟，近期國民議會議員對此提出於法國法院組織法中增訂管轄權之規定，草案版本為：「依法國商法典第L.225-102-4條和第L.225-102-5條向法院提起涉及法國企業警戒法爭議的爭訟將由一或多個指定的民事法院為審理。」此草案版

⁸⁶ Cour d'appel [CA] [regional court of appeal] Versailles, civ., Dec 10, 2020, 20/01692. Elsa Savourey & Stéphane Brabant, *The French Law on the Duty of Vigilanc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Since Its Adoption*, 6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141, 150 (2021).

⁸⁷ Notre Affaire à Tous and Others v. Total, Sabin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Law, <http://climatecasechart.com/non-us-case/notre-affaire-a-tous-and-others-v-total/>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⁸⁸ Tribunal Judiciaire De Nanterre [TJN] [Nanterre Civil Court of Justice] Nanterre, civ., Feb. 11, 2021, 20/00915.

本已於2021年5月4日在國民議會通過一讀，已送交參議院為審議，預計2021年9月能夠通過⁸⁹。

三、跨國企業境外行為管制模式

比較英國當代奴隸法和法國企業警戒法，雖然皆是採取制定具有規制域外影響的內國管制法律作為落實和回應《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要求的模式，然而，兩者管制和適用範圍、對象則有不同。英國當代奴隸法所關懷的是在英國境內從事商業活動的跨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上可能產生的奴隸等強迫勞動情形，公司註冊地為何並非所問，而法國企業警戒法則是將焦點關注於以法國為母國的跨國企業在境外所造成的人權侵害情形。

在上開兩部法律所採取的管制方式，有學者觀察到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屬於所謂的「遵守，要不解釋」（comply or explain），另一種是提供司法救濟管道（judicial mechanism）⁹⁰。前者如英國當代奴隸法（Modern Slavery Law）中，Section 54(6)(a)規定，企業對於打擊現代奴隸的相關方案和做法必須經由董事會通過，使得企業的經營層級必須將人權議題納入其層面上經營策略⁹¹。關於企業對於打擊供應鏈上的現代奴隸若未提出任

⁸⁹ Christelle Coslin & Margaux Renard, *New Jurisdiction Rules for Duty of Vigilance Disputes*, <https://www.engage.hoganlovells.com/knowledgeservices/news/new-jurisdiction-rules-for-duty-of-vigilance-disputes> (last visited May 16, 2022).

⁹⁰ Neglia, *supra* note 54, at 289-292. 許斌，跨國企業供應鏈的人權責任——以母公司與發包公司為中心，頁124，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⁹¹ *Modern Slavery Law 2015*, c. 30, § 54(6)(a) (UK): “A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statement — (a) if the organisation is a body corporate other than a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equivalent management body) and signed by a director (or equivalent).”

何方案和做法，英國當代奴隸法雖未明文規範相應的制裁法律效果，但可能將對企業聲望造成負面的影響⁹²。英國當代奴隸法所採取的管制模式是，僅要求企業必須提供與揭露給大眾他們對於打擊奴隸方案的資訊，但並未課予企業任何盡職調查的義務，換言之，若企業未揭露相關資訊，現行法律並未規定相對應的制裁手段⁹³。

然而，法國企業警戒法採取的是後者的模式，其特色在於若原告聲稱損害是因企業違反警戒責任、未履行盡職調查義務而來，可以援引法國企業警戒法的相關規定來提起訴訟⁹⁴。因為法國企業警戒法是規範所謂的程序義務（an obligation of process），而非結果義務（not the outcomes），原告必須去證明因企業違反法律所課予的程序義務、未履行盡職調查的義務而導致損害產生⁹⁵。「公司面紗」（corporate veil）的確是因跨國公司所為境外人權侵害的受害者向跨國企業母國的法院尋求救濟時的一大挑戰和阻礙，此正是法國企業警戒法所欲突破的點⁹⁶。

法國企業警戒法的規範設計，無非是要求跨國企業必須對於與其營運緊密關聯的公司負責，儘管這些公司有其獨立法人格，可以說是法國企業警戒法一個相當重要的突破點⁹⁷。然而，法國NGO在2020年發布關於法國企業警戒法實踐情況的報告，適用於該法而負有發布警戒計畫的公司共有265家，但到2020年，仍有

⁹² Neglia, *supra* note 54, at 309.

⁹³ O'Brien et al., EU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Legislation: Monitoring, Enforcement and Access to Justice for Victims,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03505/EXPO_BRI\(2020\)603505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03505/EXPO_BRI(2020)603505_EN.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⁹⁴ Neglia, *supra* note 54, at 309.

⁹⁵ Diggs et al., *supra* note 10, at 311.

⁹⁶ Actionaid et al., *supra* note 79.

⁹⁷ Diggs et al., *supra* note 10, at 311.

72家公司未公布其警戒計畫，其中不乏有如麥當勞（McDonald）、伊夫黎雪（Yves Rocher）等知名大型企業⁹⁸。

在監督機制方面，法國企業警戒法明確規定各企業必須建立其自身的監督機制，去評估警戒計畫中所採取措施是否有效⁹⁹；英國當代奴隸法雖然規範公司的揭露義務，但其並未設有相關的監督機制，而是將監督的角色交由社會大眾，由社會大眾扮演監督者的角色，此亦是學者批評英國當代奴隸法落實不彰之因素之一¹⁰⁰。除此之外，它也未要求司法機關必須去確認企業資訊提供的真實性¹⁰¹。

表一：英國當代奴隸法和法國企業警戒法的內容比較

	英國當代奴隸法 (UK Modern Slavery Law 2015)	法國企業警戒法 (Duty of Vigilance law)
相同點	具有規制域外影響的內國管制法律。 落實和回應《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要求。	
相異處		
適用範圍	在英國境內實施商業活動的跨國企業造成人權侵害情況。	以法國為母國的跨國企業在境外造成人權侵害情況。

⁹⁸ Sherpa & CCFD Terre Solidaire, Le radar du devoir de vigilance: identifier les entreprises soumises à la loi, le radar du devoir de vigilance, <https://plan-vigil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6/2020-06-25-Radar-DDV-Edition-2020.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⁹⁹ O'Brien et al., *supra* note 93.

¹⁰⁰ Micheal Bloomfield & Genevieve LeBaron, The UK Modern Slavery Act: Transparency through Disclosure in Global Governance,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ttps://www.e-ir.info/2018/09/21/the-uk-modern-slavery-act-transparency-through-disclosure-in-global-governance/>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¹⁰¹ Neglia, *supra* note 54, at 309.

	英國當代奴隸法 (UK Modern Slavery Law 2015)	法國企業警戒法 (Duty of Vigilance law)
適用主體	無論其公司的註冊地為何，只要在英國境內從事商業活動，且年營業額達3,600萬英鎊以上的公司。	1. 設立在法國、在法國境內擁有超過5,000名的員工的公司，或是 2. 上述公司本身或受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公司，其在全世界的員工超過10,000名。
法定義務	要求企業必須提供與揭露給大眾他們對於打擊奴隸方案的資訊，但並未課予企業任何盡職調查的義務。	要求法國企業必須履行人權盡職調查的責任。根據法國企業警戒法規定，公司必須制定「警戒計畫」(Vigilance Plan)。
法律效果	未規範其法律效果，但可能將對企業聲望造成負面的影響。	若原告聲稱損害是因企業違反警戒責任、未履行盡職調查義務而來，可以援引法國企業警戒法的相關規定來提起訴訟。
管制方式	「遵守，要不解釋」(comply or explain)。	提供司法救濟管道(judicial mechanism)。
監督機制	未設有相關的監督機制，而是將監督的角色交由社會大眾。	各企業必須建立其自身的監督機制，去評估警戒計畫中所採取措施是否有效。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四、歐盟最新立法發展趨勢

有鑑於歐盟會員國國內法層次紛紛針對跨國企業在全球生產供應鏈之人權盡職調查義務進行規範，2020年2月，歐盟執委會提出一份針對盡職調查所可能採取的管制模式報告，認為所謂的自願性盡職調查或是揭露報告規範模式，並沒有辦法改變跨國公

司的商業模式¹⁰²。隨後，為了提升企業與人權在歐盟的能見度和重視價值，負責司法領域的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Justice）執委Didier Reynders在2020年4月宣布並承諾歐盟即將在2021年制定關於跨國公司在人權和環境領域必須履行盡職調查強制義務的規則，企圖在商業與人權此領域建立起整合歐盟會員國的一套規範標準¹⁰³。

而歐盟議會在2021年3月10日以504票贊成、79票反對、112票棄權的比數通過對於歐盟執委會提出一份建議（recommendation），包括關於跨國公司在人權和環境領域必須履行盡職調查強制義務歐盟指令草案版本¹⁰⁴。歐盟議會此舉動無非是希望促使歐盟執委會能夠盡速提出其正式的草案版本，加快企業與人權在歐盟的落實。

從歐盟議會所提出的草案版本觀之，第1條即開宗明義地指出此指令的目的在於「確保在歐盟境內營運的公司能夠履行其尊重人權、環境和良好治理的責任，不要因為其本身的活動，或是與其商業關係或是供應鏈直接相關的營運、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而對於人權、環境和良好治理造成潛在或是負面的影響，且同時也

¹⁰² European Commission, Study on Due Diligence Requirements Through the Supply Chain-Final Report, at 218-219 (Feb. 20, 2020).

¹⁰³ European Commission Promises Mandatory Due Diligence Legislation in 2021, 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 <https://responsib lebusinessconduct.eu/wp/2020/04/30/european-commission-promises-mandatory-due-diligence-legislation-in-2021/>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¹⁰⁴ EUROPEAN PARLIAMENT,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10 MARCH 2021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CORPORATE DUE DILIGENCE AND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1-0073_EN.html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必須避免和減輕這些負面影響的產生。¹⁰⁵」

草案第2條則是規定這些公司必須針對供應鏈進行盡職調查的義務，另從指令的第1條第2項和前言第12段¹⁰⁶，也特別說明這些盡職調查的要求是為了促進歐盟市場的良好運作。從此角度而言，此指令乃建立在促進歐盟市場的良好運作和整合的目的之上，加諸歐盟境內的公司必須針對其供應鏈為盡職調查的義務。換言之，此指令試圖要求歐盟境內公司充分利用自身與客戶和供應鏈的關係，加諸歐盟境內公司法定的盡職調查義務，企圖扭轉在其生產供應鏈上的歐盟境外公司於人權、環境和良好治理的商業慣習，發揮在歐盟域外的影響力¹⁰⁷。

¹⁰⁵ Article 1 of the draft of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rporate Due Diligence and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This Directive is aimed at ensuring that undertakings under its scope operating in the internal market fulfil their duty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the environment and good governance and do not cause or contribute to potential or actual adverse impacts on human rights, the environment and good governance through their own activities or those directly linked to their operations, products or services by a business relationship or in their value chains, and that they prevent and mitigate those adverse impacts.”

¹⁰⁶ Recital 12 of the draft of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rporate Due Diligence and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In order to ensure a level playing fiel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undertakings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und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a legal duty at Union level. By coordinating safeguard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environment and good governance, this Directive should ensure that all Union and non-Union large undertakings and high-risk or publicly list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undertakings operating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re subject to harmonised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which will prevent regulatory fragmentation and improve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l market.”

¹⁰⁷ Davies et al., Commentary: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Draft Directive

該草案要求各會員國必須指定權責機關來負責監督該指令是否確實落實，並有權調查各公司是否履行該指令所加諸之義務（第12、13條）¹⁰⁸。該指令亦要求各公司必須設有內部的申訴機制，包括風險預警和調解機制，提供股東能在公司的商業活動在人權、環境或是良好治理方面有潛在或是實際的負面影響發生時，有一發聲和溝通的管道（第9條）¹⁰⁹。此外，該指令也指出各會員國必須確保受害者尋求司法救濟的機會，即便公司已提出相關的補救措施。受害者可透過公司所提供的申訴機制進行調解，以尋求救濟，但會員國必須確保此不會阻礙受害者可向外尋求法院救濟的可能性。又即便申訴機制已作出決定，此對於法院來說，僅構成參考而非具有拘束效力（第10條）¹¹⁰。

而該指令的草案版本受到最大的批評之處在於要求公司達到的盡職調查義務的程度和內容不明確，過於空泛。在該指令草案版本的前言第21、23、24段洋洋灑灑臚列了國際人權公約、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工作的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兒童權利公約、歐洲人權公約、美洲人權公約、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等等將近數十種人權公約標準，有學者即批評此指令要求公司所要履行盡職調查義務的內容標準究竟為何，標準並不明確，將會造成適用和落實的難題¹¹¹。

即便目前對於該草案的版本遭受到批評，然而從歐盟的法制

on Corporate Due Diligence and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ECGI, <https://ecgi.global/news/commentary-european-parliament%E2%80%99s-draft-directive-corporate-due-diligence-and-corporate>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¹⁰⁸ EUROPEAN PARLIAMENT, *supra* note 104.

¹⁰⁹ EUROPEAN PARLIAMENT, *supra* note 104.

¹¹⁰ EUROPEAN PARLIAMENT, *supra* note 104.

¹¹¹ Davies et al., *supra* note 107.

動向和趨勢來看，賦予跨國公司強制盡職調查義務勢在必行，這勢必也會對於跨國公司帶來不小的衝擊。在歐盟議會的催促之下，2022年2月23日，歐盟執委會正式提出關於企業永續發展之盡職調查指令（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and amending Directive (EU) 2019/1937）草案版本¹¹²，後續值得密切注意和追蹤後續發展。

五、小結：比較法對於我國跨國公司境外投資管制模式的啟發

如前所述，企業與人權此領域具有高度的「跨國」性質，透過國際組織、自律組織等治理主體發展管制和規範跨國企業及其母國義務等原則性準則，過去以規制內國法秩序為導向的內國法律似乎無法發揮功效。然而，從歐洲各國近期立法趨勢來看，內國法並無缺席，而以另一種面貌來回應跨國特色，逐漸發展出具有規制域外影響的內國法律（Transnational State Legislation）¹¹³，國家有其義務管制母公司在本國的跨國企業於境外行為，或是在其境內為經濟活動的跨國企業。

從本文介紹的當代奴隸法和法國企業警戒法觀之，其將原本僅具有軟法性質的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所揭示的盡職義務，納入其具有強制力的內國管制法律的內容。在歐盟會員國國內法層次逐漸對於跨國企業在全球生產供應鏈之人權盡職調查義務進行規範，也成為一大助力要求歐盟必須盡快對於商業與人權之議題作出回應，加速立法進程。就此現象，可以發現，過往似

¹¹²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and Amending Directive (EU) 2019/1937, COM (2022) 71 final (Feb. 23, 2022).

¹¹³ Paiement, *supra* note 66, at 835.

乎國際組織扮演議程設定的領頭羊，藉由國際組織規範之制定，揭示議題之重要性，吸引各國國內關注，並進一步期待能夠將國際組織規範內國法化。然而，如今涉及跨國事務領域日趨複雜與多元，各國皆無法置身於外，藉由制定具有規制域外影響的內國法律，以達即時迅速回應跨國性質問題之目的，成為某一議題的先行者，反而推進國際組織規範的制定。換言之，在企業與人權此種強調高度跨國性質之領域，不僅僅只是國際組織規範單方面影響內國管制法律內容的形塑，內國法律也回過頭來影響國際組織的規範內容，即國際和國內管制層面形成雙向的互動模式，進一步推展全球行政法的發展。

將視野拉回我國，從我國「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內容觀之，臚列目前散落在各部法律中涉及企業與人權的相關法規，並揭示未來將推動之措施以及方向，雖然逐步朝向將《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的內容落實於我國法律之中，但仍似乎尚未見有針對生產供應鏈、或是跨國企業境外人權侵害行為等特定領域或範圍制定特別法的傾向。以下將建立在比較法之基礎上，並進一步檢視我國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內容，給予未來我國在管制跨國企業境外行為可能採取管制模式的啟發與建議。

（一）我國企業與人權之現況

我國「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乃為落實《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所制定，並以《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的「國家保護義務」、「企業尊重人權」、「提供有效救濟制度」三大支柱作為架構，逐一說明目前國家已經所採取的因應措施以及未來將推動的改革和修法方向¹¹⁴。目前的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已提到我國已在涉及政府採購事項等相關法規中加入保障人權要

¹¹⁴ 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前揭註71。

求¹¹⁵；如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10條第4款第5目已經明定公司治理報告應記載履行社會責任情形¹¹⁶、行政院已經核定金管會所提之「綠色金融行動方案」，鼓勵銀行採行赤道原則¹¹⁷；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也參考赤道原則精神增訂授信準則，建議銀行在授信審核時，審酌企業向銀行貸款時是否善盡相關企業社會責任等¹¹⁸；「公司國外投資處理辦法」第6條規定已明定我國企業於境外曾有違反國際條約的義務者，將否准其申請，又若已經核准於國外投資者，要求逐案加註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等¹¹⁹。在未來將推動的措施中，在跨國投資行政管理方面，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提及將針對我國企業於境外投資時，特別針對反歧視、勞動、環境等特殊領域，研擬、制定具有境外效力範圍之特別法的可行性¹²⁰。

細究目前我國所提出的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涉及本文所聚焦和研究的跨國投資行政管制規範，雖然在行動計畫中臚列多項我國目前已經實踐或落實的措施，但似乎較侷限於我國企業於境內落實人權保障的面向，缺乏跨國企業或處理域外的面向，似乎仍有不足；而在未來推動的方向，可略為得知我國似乎有往制定所謂具有規制域外影響的內國法律的方向前進，但關於實際細節或是適用範圍與領域仍付之闕如。

此外，特別是在域外管轄這塊，從我國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得知將針對「我國企業在境外造成人權侵害」及「在我國境內實施商業活動的外國跨國企業於我國造成人權侵害」等兩面向之跨

¹¹⁵ 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前揭註71。

¹¹⁶ 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前揭註71。

¹¹⁷ 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前揭註71。

¹¹⁸ 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前揭註71。

¹¹⁹ 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前揭註71。

¹²⁰ 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前揭註71。

國訴訟案件，研擬提供被害人有效的相關救濟制度等。從近期關於臺灣所發生跨國企業侵害人權之事件中，最受社會矚目為台塑越鋼案和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工傷案，其分別對應上述兩個面向的跨國訴訟案件。

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於1970年來臺灣桃園設廠生產電子零件，然而於設廠期間排放有毒物質，導致數萬名員工長期暴露在有毒物質中，導致數萬名員工健康受害，甚而罹癌、死亡。受害員工於1998籌組自救會，2004年向RCA及其母公司提起跨國訴訟，纏訟將近20年，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7號民事判決首次引用揭開公司面紗原則，要求幕後控制公司的股東、母公司奇異、百慕達湯姆笙、Technicolor必須與RCA公司同負起連帶賠償責任¹²¹。有別於RCA是外國跨國公司於我國造成環境污染和人權侵

¹²¹ 「按法人格獨立原則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固為現代公司法制發展之基石。惟公司股東倘濫用公司獨立人格，利用公司型態迴避法律上或契約上之義務，造成社會經濟失序或其他侵害債權人等顯不公平情形時，公司法人格獨立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即有加以調整之必要。英美法系、德國法就此分別發展出揭穿公司面紗原則、法人格否認理論、直索理論等，俾能在特殊情形得以否認公司法人格，排除股東有限責任原則，使股東就公司債務負責或追究股東責任，以達衡平救濟之目的。我國公司法雖於102年1月30日始增訂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規定，將揭穿公司面紗理論予明文化。惟學者早於六、七〇年代即將前開理論介紹引進，公司法在86年6月26日增訂第6章之1關係企業乙章，已蘊含揭穿公司面紗原則等相關理論之思維，司法實務亦有多件判決循此思維，運用權利濫用或誠信原則為論據，用以保護公司債權人。是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增訂前，揭穿公司面紗原則等相關理論已屬法理，依民法第1條規定，自得適用之。而上開法理並非全盤否定公司法人格獨立，僅在個案上，如控制股東有詐欺、過度控制、不遵守公司形式、掏空公司、或藉公司型態逃避法令規範、契約義務、侵權責任等濫用公司法人格之不正行為，致損害公司債權人時，為維誠信及衡平救濟，例外地否認公司法人格予以救濟。」

害的事件，台塑越鋼案則是我國第一起涉及我國企業於境外造成環境侵權訴訟案件。台塑本來預計在雲林建設大煉鋼廠，但因為環評未過，而後選擇到越南設廠。2016年4月間，越南河靜鋼鐵廠疑似因廠區發生跳電意外，排出含有苯酚、氫化物等有毒廢水，導致大量魚群死亡，而在越南河靜省及中部周邊省份的海域造成大規模的公害污染事件，使得以漁業為生的居民工作權，甚至是生命權受到侵害。臺灣律師團於民國108年6月11日代理越南中部省份7,875位居民向臺北地方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後遭臺北地方法院裁定駁回，而後律師團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抗告，亦遭到臺灣高等法院駁回抗告，律師團成員又針對該駁回抗告向臺灣最高法院提起再抗告，最高法院109年台抗字第1084號民事裁定認為高等法院在國際管轄權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恐有疑義，因此廢棄原裁定，發回高院更裁。此為最高法院首次在最高法院對於我國對於跨國環境侵權訴訟是否享有國際管轄權表示立場和意見¹²²。

無論從RCA或是台塑越鋼案觀之，突顯我國法制上欠缺對於跨國企業下受害者救濟途徑¹²³。RCA案從受害者提起訴訟至勝訴獲得賠償金定讞，訴訟過程走了將近二十年，而台塑越鋼案，突顯我國在國際管轄權之立法闕漏與不足，就國際管轄權是否類推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實務見解亦有所歧異，導致在程序面

濟，與法人格獨立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不生扞格，亦無礙我國經濟之發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7號民事判決參照。

¹²² 針對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084號民事裁定之評釋，請參照沈冠伶，環境侵權訴訟共同被告之國際審判管轄權——最高法院109年台抗字第1084號民事裁定之評析，臺灣法律人，第2期，頁120-142（2021）。

¹²³ 由於本文以我國跨國公司在境外為人權侵害為核心內容，RCA案乃涉及外國企業在我國境內造成人權侵害面向，非本文所聚焦討論之研究範圍，該如何加強此種面向之管制面向有待後續進一步研究。

即耗費許多時間。對於跨國企業所造成的人權侵害事件，目前我國似乎採取跨國訴訟模式為回應模式，誠然，跨國訴訟雖然是一種途徑和解方，然如本文所關懷和主張，似乎應該「超前布署」，防範勝於事後救濟，加強跨國公司境外投資的行政管制。

（二）比較法對於我國跨國公司境外投資管制模式的啟發

從我國目前「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內容，「我國企業在境外造成人權侵害」及「在我國境內實施商業活動的外國跨國企業於我國造成人權侵害」揭示其關懷的重點，且分別從台塑越鋼案或是RCA案的訴訟經驗以觀，事後採取跨國訴訟尋求救濟固然是必要的，但如本文所主張，國家應提前介入對於跨國公司境外投資的管制。加上，我國似乎有往制定所謂具有規制域外影響的內國法律的方向前進，本文所介紹的英國當代奴隸法和法國企業警戒法能提供相關借鏡與指引。

為扣緊本文以我國跨國公司在境外為人權侵害為討論，以下制度建議的方向將以我國企業至境外投資行為面向之管制為主。從比較法的經驗上，關於課予企業之法定義務方面，英國當代奴隸法採取所謂的「遵守，要不得解釋」的規範模式，給予企業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企業對於風險評估可自由選擇揭露的項目，若不揭露則必須負起說明理由的義務即可，將監督的角色交由社會大眾，但此種管制模式雖賦予企業有風險揭露的義務，但揭露範圍卻給予企業裁量權，其只須負起為何不揭露的說理義務；而法國企業警戒法則採取截然不同之規範方式，強制要求公司必須制定所謂的警戒計畫，包括風險地圖等，也要求企業必須建立自身的監督機制，評估減低風險的措施是否有效。本文認為，法國企業警戒法強制要求制定警戒計畫、風險揭露和說明的強制義務較為可採。在英國當代奴隸法採取的規範模式，僅要求企業針對某

些風險採取不揭露的立場，負起說理義務，但此說理義務的程度究竟如何衡量，似乎並沒有明確的標準，進一步而言，若此說理義務採取寬鬆的審查標準，是否可能造成企業消極不揭露各項風險，社會大眾也無從監督，更別說達到避免境外人權侵害或環境污染的發生。

從我國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中，關於我國企業至境外投資行為的部分，雖然說明「公司國外投資處理辦法」第6條規定已明定我國企業於境外曾有違反國際條約的義務者，將否准其申請，又若已經核准於國外投資者，要求逐案加註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等¹²⁴，或是相關法規已加強企業揭露履行社會企業責任或是保障人權等非財務資訊¹²⁵。然而，本文認為目前針對已經核准赴外投資的我國公司，只有逐案加註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但是並未針對核准後於境外發生侵權行為之情況予以規範或管制，又即便現有法制要求企業提供或揭露非財務資訊，但關於未履行該揭露義務的法律效果為何，亦未有進一步規範。

在此脈絡之下，本文認為對於我國企業至境外投資行為，我國應參照法國企業警戒法之規範模式，要求有意於我國境內從事投資行為或是商業活動的跨國公司或是我國有計畫於境外從事投資行為的企業，於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時，即強制課予企業必須提交風險調查報告，以及相應之防範或減低風險措施，負起人權或環境風險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的義務和責任，並賦予相關利害關係人就企業未履行盡職調查之程序義務提起司法救濟的途徑。再者，企業所提出的風險調查報告，以及相應之防範或減低風險措施，作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承諾，若後續有相關訴

¹²⁴ 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前揭註71。

¹²⁵ 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前揭註71。

訟，亦應將此承諾作為提高企業注意義務標準之憑據¹²⁶。此外，修改「公司國外投資處理辦法」，針對核准後於境外發生侵權行為之情況，有相應的處罰機制；而在政府採購領域方面，研擬所謂的「投標廠商人權紀錄評量指引」，將所謂的生產供應鏈的揭露義務條款納入政府採購契約裡，逐步促使公司或廠商必須落實人權盡職調查的義務¹²⁷。

肆、結 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談論企業與人權，跨國要素絕對無法忽

¹²⁶ See *Four Niger Delta Farmers v. Royal Dutch Shell*. 此案件為第一次荷蘭跨國企業母公司因為國外子公司在國外造成之環境污染和人權侵害事件而在荷蘭遭到起訴。事實概要為殼牌公司自1958年在奈及利亞開採石油，特別是集中在尼日河三角洲地區（the Niger Delta area）。因於漏油所導致之環境污染事件，影響範圍廣泛，橫跨農田以及捕魚地區，在該污染地區居住或工作之民眾，其健康受到極大危害，也嚴重影響以農業和捕魚維生民眾之經濟生計。其中，四名Friday Alfrad Akpan, Chief Fidelis Ayoro Oguru, Alali Efang and Eric Barizaa Dooh為來自奈及利亞Oruma, Goi和Ikot Ada Udo農村之農民，主張奈及利亞殼牌石油發展有限公司（Shell Petroleum Development Company of Nigeria Ltd）和其主事務所位於荷蘭之母公司荷蘭皇家殼牌有限公司（Royal Dutch Shell）對於因油管和油井的漏油而造成的環境污染事件未盡其保護義務，而對其所導致之損失，要求賠償，分別在荷蘭法院提起訴訟。荷蘭海牙地方法院於該案中，特別指出殼牌集團在企業活動對於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方面，自願承諾履行社會企業責任，法院認為該承諾提高了母公司的注意義務標準。See District Court of The Hague, *Akpan v. Royal Dutch Shell Plc et al.*, C/09/337050 / HA ZA 09-1580, para. 6.9 January 30, 2013.

¹²⁷ Micheael Bloomfield & Genevieve LeBaron, *The UK Modern Slavery Act: Transparency through Disclosure in Global Governance*,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ttps://www.e-ir.info/2018/09/21/the-uk-modern-slavery-act-transparency-through-disclosure-in-global-governance/> (last visited May 31, 2021).

視。特別是伴隨全球生產鏈、跨國企業的興起，透過不同層次且多元的行動者，例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之《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超國界組織歐盟相關立法、歐洲內國制定帶有域外影響的內國管制法律（domestic measures with extraterritorial implications），或是私人金融機構發展赤道原則等，共同建構並交織出全球治理體系。

除此之外，我們發現，強調跨國的今日，國家的角色並未消失，反而是對於傳統僅以規制內國行政法秩序的行政法重新予以定位，並思考其新角色。換言之，從前述所介紹歐洲各國盡其所制定帶有域外影響的內國管制法律以觀，亦是全球行政法之一環¹²⁸。更有甚者，其建立示範作用，進而影響歐盟預計擬定關於跨國公司在人權和環境領域必須履行盡職調查強制義務的規則，要求各會員國必須將此價值落實到歐盟各會員國。

檢視我國「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內容，雖提出方針、原則性的發展方向，但對於如何具體落實其原則和相應法規的內容，目前並不明朗，現階段而言，似有針對既有各領域的法規範進行修正，後續往制定帶有域外影響的內國管制法律方向進行。本文認為，採取跨國訴訟固然是一種回應跨國企業侵權的模式，但是訴訟程序耗時，國家應提前介入對於跨國公司境外投資的管制。加上，我國似乎有往制定所謂具有規制域外影響的內國法律的方向前進。參照比較法的經驗之下，本文認為無論是外國企業至我國境內從事投資行為或是我國企業至境外投資行為，我國皆應制定相對應的管制規範，要求有意於我國境內從事投資行為或是商業活動的跨國公司或是我國有計畫於境外從事投資行為的企業，強制課予企業必須負起人權或環境風險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的義務和責任，並賦予相關利害關係人就企業未履行

¹²⁸ Ladeur, *supra* note 24, at 259.

盡職調查之程序義務提起司法救濟的途徑。此外，修改「公司國外投資處理辦法」，針對核准後於境外發生侵權行為之情況，有相應的處罰機制；而在政府採購領域方面，研擬所謂的「投標廠商人權紀錄評量指引」，將所謂的生產供應鏈的揭露義務條款納入政府採購契約裡，逐步促使公司或廠商必須落實人權盡職調查的義務。

針對目前該法制上的缺漏，或許可透過自律組織所訂定的相關準則作為補充現行對於我國企業赴外投資管制審查面向的不足。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於2014年參考赤道原則的精神，於其會員授信準則增訂第20條第5項「辦理企業授信審核時，宜審酌借款戶是否善盡環境保護、企業誠信經營及社會責任」，以期金融業者在辦理相關融資審核業務時，能將企業社會責任之精神納入考量。而私人金融機構所提出所謂的「赤道原則」(EPs)雖屬於金融機構自願性簽署，然目前我國八大公股行庫將全面簽署赤道原則，針對將來的授信融資案皆必須通過環境和社會的風險評估審查¹²⁹，落實綠色金融。針對我國企業於國外進行大型的專案投資融資計畫，由借貸方負起企業責任，在投資的最前端為把關的角色，雖其非具有強制力的法規範，而交由各金融機構自願性遵循的準則，但在全球提倡社會企業的意識潮流，以及經營和維持自身商譽形象之誘因之下，其也能達到有如強制規範的管制的效果。

全球行政法所呈現的多元行政管制主體、多層次的國際法、國內法的對話與互動，以及軟法、硬法的交織，在企業與人權的領域極具顯著，雖然對於如何就本國企業在境外所為的行為進行

¹²⁹ 朱漢嵩，八大行庫 將全面簽署赤道原則，工商時報，2021年03月19日，<https://ctee.com.tw/news/finance/432011.html> (2021/03/31，造訪)。

管制，仍是起步階段，並逐步嘗試並修正，然透過比較法的經驗可知，目前各國正朝向將國際法上的大框架具軟法性質的指導原則落實為國內硬法的趨勢，且透過私人自律組織的相關規範也能夠達到一定的規範效果。因此，本文主張不妨透過硬法和軟法雙管齊下逐步建構對於企業在境外行為的管制架構，試圖在人權保障與企業利益之間達至平衡。

中原財經法學

參考文獻

書 籍

- 法務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般性意見第24號一般性意見，法務部，修訂2版（2018）。
- 許斌，跨國企業供應鏈的人權責任——以母公司與發包公司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EDITION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1).
- TOBLER, CHRISTA, JACQUES BEGLINGER, ESSENTIAL EU LAW IN TEXT (HVG-ORAC, Budapest, 4th ed., 2018).

期刊論文

- 沈冠伶，環境侵權訴訟共同被告之國際審判管轄權——最高法院109年台抗字第1084號民事裁定之評析，臺灣法律人，第2期，頁120-142（2021）。
- 林士傑，國際ESG風險與監理趨勢及銀行業永續金融發展商機，銀行公會會訊，第123期，頁1-6（2021）。
- 林孝哲、黃雯郁，試析歐盟衝突礦產規則於WTO協定下之適法性爭議，經貿法訊，第239期，頁10-27（2018）。
- 林春元，全球行政法的發展、功能與侷限——以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體制為例，月旦法學雜誌，第283期，頁152-163（2018）。
- 張蕙嫻，赤道原則之現況，銀行公會會訊，第88期，頁3-12（2015）。
- 陳麗娟，EU公司治理下企業社會責任之研究，月旦財經法雜誌，第39期，頁45-72（2016）。
- Biermann, Frank & Philipp Pattberg,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aking Stock, Moving Forward*, 33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 AND RESOURCES 277-294 (2008).
- de Búrca, Gráinne, *Developing Democracy Beyond the State*, 46 COLUM. J. TRANSNAT'L L. 221-278 (2008).
 - Diggs, Elise Groulx, Mitt Regan & Beatrice Parance,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s a Galaxy of Norms*, 50 GEO. J. INT'L L. 309-362 (2019).
 - Jang, Jinseop, Jason McSparren & Yuliya Rashchupkina, *Global Governance: Present and Future*, 2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1-5 (2016).
 - Kingsbury, Benedict, *The Concept of 'Law' 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20 EUR. J. INT'L L. 23-57 (2009).
 - Krisch, Nico & Benedict Kingsbury, *Introducti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17 EUR. J. INT'L L. 1-13 (2006).
 - Kuo, Ming-Sung, *The Concept of 'Law' 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A Reply to Benedict Kingsbury*, 20 EUR. J. INT'L L. 997-1004 (2009).
 - Ladeur, Karl-Heinz,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and Transnational Regulation*, 3 TRANSNATIONAL LEG. THEORY 243-267 (2012).
 - Lance, Joshua A., *Equator Principles III: A Hard Look at Soft Law*, 17 N.C. BANKING INST. 175-199 (2013).
 - Lindsay, Rae, Anna Kirkpatrick & Jo En Low, *Hardly Soft Law: The Modern Slavery Act 2015 and the Trend Towards Mandatory Reporting on Human Rights*, 18 BUS. L. INT'L 29-50 (2017).
 - Mantouvalou, Virginia, *The UK Modern Slavery Act 2015 Three Years on*, 81 THE MODERN LAW REVIEW 1017-1045 (2018).
 - Neglia, Maddalena, *The UNGPs—Five Years on: From Consensus to Divergence in Public Regulation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34 NETHERLANDS QUARTERLY OF HUMAN RIGHTS 289-317 (2016).
 - O'Sullivan, Niamh & Brendan O'Dwyer,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on a*

Financial Sector Legitimation Process: The Case of NGOs and the Equator Principles, 22 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 553-587 (2009).

- Salminen, Jaakko & Mikko Rajavuori, *Transnational Sustainability Laws and the Regul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Comparison and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26 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 602-627 (2019).
- Santner, Ashley L., *A Soft Law Mechanism fo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How the Update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Promote Business for the Future*, 43 GEO. WASH. INT'L L. REV. 375-388 (2011).
- Savourey, Elsa & Stéphane Brabant, *The French Law on the Duty of Vigilanc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Since Its Adoption*, 6(1)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141-152 (2021).

專書論文

- 葉俊榮，全球化對行政法的挑戰：從行政法人的建制談起，收錄於法治與現代行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頁365-380，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 Paiement, Phillip, *Transnational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 and the Law*, in: PEER ZUMBANSE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RANS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21).
- Ronit, Karsten, *Organized Business and Global Public Policy: Administ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Regulation*, in: DIANE STONE & KIM MOLONE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POLICY AND TRANS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9).
- Scott, Colin, *Regulation in the Age of Governance: The Rise of the Post Regulatory State*, in: J. JORDANA & D. LEVI-FAUR EDs.,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ULATORY REFORMS FOR THE AGE OF

GOVERNANC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Northampton, 2004).

- Voss, W. Gregory, *The European Union's 2014 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 Mandatory Ex Post Disclosure-But Does It Need Improvement?*, in: AMISSI MELCHIADE MANIRABONA & YENNY VEGA CÁRDENAS EDS.,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HUMAN RIGHTS IN AN ERA OF GLOBAL JUSTICE: NEW WAYS OF RESOLVING AND PREVENTING CONFLICTS* (LexisNexis, Canada, 2019).

研究報告

- 林佳和，我國推動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之評估分析，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之研究成果報告（2016）。

中原財經法學

摘 要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經貿生產供應鏈橫跨全球，跨國企業在全球化時代作為重要主角之一，伴隨著人力、資金、服務的流動，全球治理乃在企業與人權的領域更加明顯。在此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成為重要價值，在國際法層次已出現如《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第24號一般性意見書等方針或指導原則。又從比較法的角度觀之，各國制定所謂的帶有域外影響的內國管制法律（Transnational State Legislation），逐漸將指引或指導原則具體化為國內法規。我國已經公布「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提供未來方向和指引，但究竟如何具體化和落實其價值和內涵，仍必須進一步研擬。本文希冀透過介紹和分析各國所制定的跨國永續法律所採取的管制方式，對於未來我國在制定相關法律制度時提供一些啟發。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 Regulatory Framework Based on Global Governance

Yi-Chen Huang

Abstract

Under globalization, supply chains and trade networks span the glob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critical protagonists in this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addition, given the flow of labor, capital, and services, glob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more influential in the realms of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llowing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gain considerable traction. At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law, several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such as 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24), have been formulated. Multiple countries have also developed domestic measures with extraterritorial effects to gradually internalize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or guiding principles into domestic regulations. However, although Taiwan has announced National Action Plan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to provide future directions and guidance, how to concretize and implement these plans requires further stud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control methods incorporated into the transnational perpetual laws formulated by various countries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Taiwan on the basis of which relevant laws and systems and control tools can be developed and adopte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global governance, due diligenc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supply chains, domestic measures with extraterritorial implications

中原財經法學